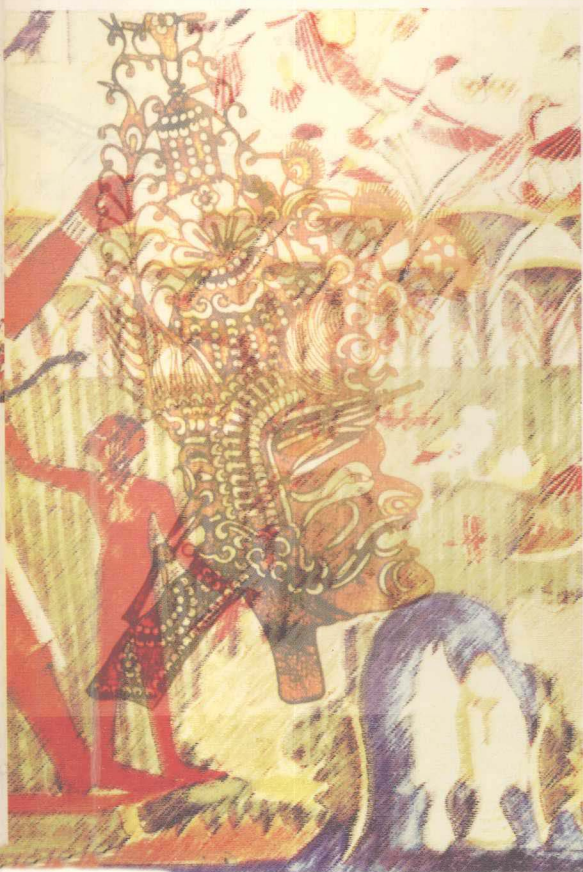


民族旅游的 人类学透视

中西旅游人类学研究论丛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Ethnic Tourism



主编 张晓萍
副主编 杨慧 赵红梅

By Zhang Xiaoping

云南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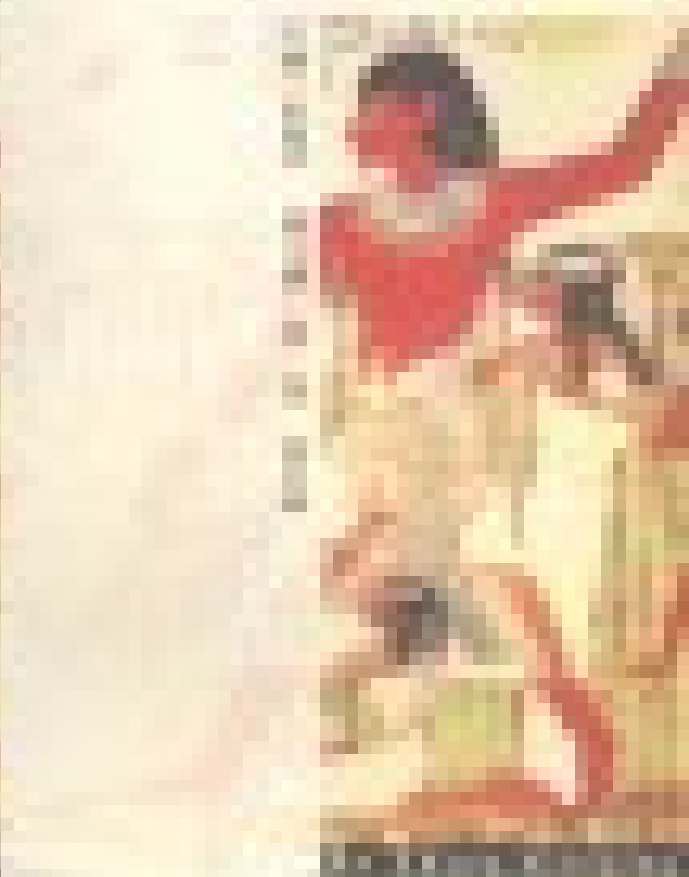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民族旅游的

人类学透视

中国旅游人类学研究会编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Ethnic Tourism



中国旅游人类学研究会编

民族出版社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视

中西旅游人类学研究论丛

on **E**thnic **T**ourism

张晓萍 主 编
杨 慧 副主编
赵红梅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视/张晓萍主编.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5
(中西旅游人类学研究论丛)
ISBN 7-81068-908-8

I. 民... II. 张... III. 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旅
游资源—资源开发—研究—云南省 IV. F592.7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8464 号

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视

——中西旅游人类学研究论丛

主 编: 张晓萍
副 主 编: 杨 慧 赵红梅
策划编辑: 蔡红华
责任编辑: 宋 武
封面设计: 刘 雨
责任校对: 何传玉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53 千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068-908-8/F·328
定 价: 28.00 元

社 址: 云南省昆明市一二·一大街 18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5033244 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序

彭兆荣

张晓萍教授嘱我为她主编的《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视——中西旅游人类学研究论丛》作序，我深感荣幸。

从学科意义上说，人类学对旅游的研究相当晚近。按照西方旅游人类学家的说法，直到20世纪60年代前后才宣告出现。虽然人类的旅行文化(travelling culture)早就开始，严格地说，有了“人”的认定、概念、价值和行为规范，旅行也就随之产生。旅行也被作为人类“知识考古”和“知识系统”的一项重要指标。既然“人的出现”必然伴随着“人的旅行”，为什么人类学对她的研究却迟到了呢？这显然是一个问题。她与人们对旅游(tourism)的社会认知有关，正如著名旅游人类学家格雷本(Nelson, H. H. Graburn)教授对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一句名言“是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的改造那样，“去旅游还是不去旅游，这是一个问题。”从旅行到旅游，人类社会在这一巨大的“词汇”历史变迁中附会了太多背离、太多悖理、太多矛盾，因而有了太多变化的社会语义。其情势仿佛二十多年前的中国，“旅游”属于天方夜谭，属于社会行为和道德伦理的“黄腔走板”，“大有问题”，可是时至今日，如果人们不去旅游便被认为是“过时的”生活时尚，同样“大有问题”。国家机器和传媒也跟着为之“打气”，旅游被赋予了“社会和经济发动机”的神奇功效。换言之，旅游成为索解现代社会和现代性“迷思/神话”(myth)的一个最好注疏。令人觉得蹊跷的是，似乎鲜见有人对旅游的“角色转换”进行深入的理性追问，明摆着答案可能正蕴涵其中。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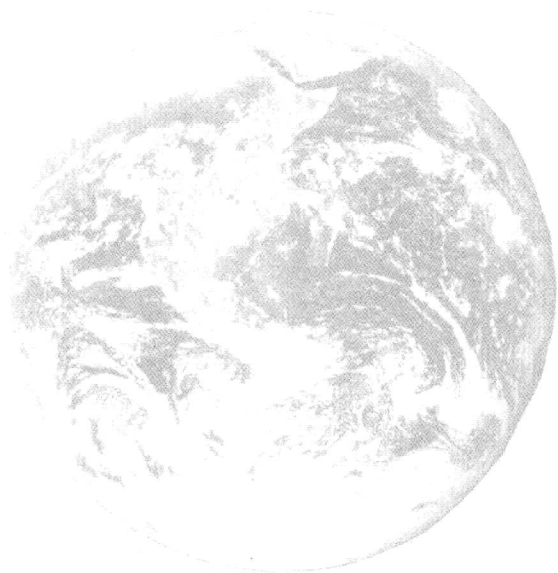
不言而喻，人类学是一个专事解析人类社会“迷思”的学科，对这一酝酿了近半个世纪的现代“问题”的思索，人类学自然不能缺席发言，更做不到“失语”。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发达国家，包括国际组织、大学教育和科研机构，人类学对旅游的研究总引人关注的原因。所以，与其说旅游人类学的分析是对与旅游和移动性（mobility）所引入的人类现代生活方式、思考、表述和行动的所谓“范式”（paradigm）革命和转型的独到视野，还不如说是出自于学科的一种“责任”。人类学家看到，现代人类社会生活的稳定恰好来自于不断移动和迁移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就像今天的人们如果忘记携带移动电话或便携电脑就会“若有所失”、“心怀不安”一样；现代人类社会的“航路”与人们生活的“轨迹”已经非常习惯于在移动和变化中求得“稳定”和“安宁”，这种“范式”的社会演变和“历史真实”（historical reality）在当代西方著名的人类学批评理论家克里福德（Clifford, J.）出版于1997年的重要著作《航路：二十世纪晚期的旅行与转移》（*Routes—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一书中有完整的表达。

另一方面，人类学对旅游的研究也促使了人类学对历史（包括“他的历史”，人类学学科史等）的反思，比如旅游人类学对传统的民族志（ethnography）的全面思考与实践，就对传统的民族志中的所谓“异文化”（other culture）的静态性、封闭性、停滞性的社会和文化“假定”提出了质疑，因为，将传统的民族志理念和方法完整地移植于旅游人类学的“田野作业”（field work）中显然困难重重，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暂时性”，东道社会受现代大众旅游（mass-tourism）的影响以及所面临的空前的社会文化变迁等，都为当代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半自动”或“自动民族志”（auto-ethnography）的概念遂被提出来。“写文化”（writing culture）也在旅游文化中被加以检讨。与此同时，“真实性”（authenticity）、“通过仪式”（the rites of passage）、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地方力量（regional force）、展演（performance）、旅游标志的符号结构（markers）等都成了人类学的“知识平台”（knowledge platform）上讲述和表达的重要内容。当然，“可持续性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更是旅游人类学作为应用学科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题。

旅游人类学是一门晚近的学科，旅游人类学在我国的引进更是迟来的学问。张晓萍教授无疑是这门迟来学问的重要引介者之一，《民族旅游业开发的人类学透视——中西旅游人类学研究论丛》不啻为一个“用事实说话”的例证，相信它的出版会给这一富有魅力的学科开启一扇窗户。

是为序。

2004年10月8日于厦门大学海滨寓所



序



目 录

序	彭兆荣 (1)
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述评	宗晓莲 (1)
旅游人类学在美国	张晓萍 (15)
用人类学眼光看旅游	李 莉 张晓萍 (24)
西方旅游人类学两大研究流派浅析	宗晓莲 (38)
(后) 现代性与移动性: 生态环境所面临的挤压	
——兼论旅游人类学视野中的“旅游文化”	彭兆荣 (46)
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人类学透视	
——以云南为例	张晓萍 (59)
“场域理论”及其对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启示	光映炯 (69)
民族旅游与族群认同、传统文化复兴及再建构	
——云南民族旅游开发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	
	杨 慧 (83)
“旅游是一种现代朝圣”刍议	张晓萍 (93)
论旅游的精神文化本质	郑晴云 (100)
旅游、现代性与怀旧	张晓萍 刘天翌编译 (115)
旅游业与“舞台真实”	
——一种西方旅游人类学的观点	张晓萍 (127)





想像的真实与真实的商品	
——经济人类学视野中的现代旅游	马矜炜 张帆 (136)
旅游业发展中的文化价值论	
——以云南丽江旅游业为例	张波 (147)
旅游业中的文化商品化与文化真实性	
——以民族文化为例	赵红梅 (154)
旅游体验的现象学模式研究	晏鲤波 (167)
旅游发展与云南丽江古城命运的思考	杨慧 (178)
从旅游人类学的视角透视云南旅游工艺品的开发	张晓萍 (185)
旅游象征消费对云南石林旅游商品开发的启示	马晓京 (192)
旅游艺术品：发展方向及其文化复兴功能	陈昕 (208)
关乎人文，体验真实	
——评介西蒙·A. 亚伯拉姆所著《怎样应对旅游所带来的冲击	
——来自 the Deep Green Heart of France 的一种观点》	
.....	罗辉 (217)
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再认识	马晓京 (226)
民族旅游与社会性别建构	
——以宁蒗落水村摩梭妇女为个案	杨慧 刘永青 (243)
后记	(256)

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述评

宗晓莲 中央民族大学

很早以前，人们就开始周游各地，但只是到了后来，旅行者才把自己的旅游经历写下来，留下各种游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者开始关注日益发展的旅游现象。至今，这一领域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北美和西北欧的学者。人类学者真正意义上参与旅游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几十年过去了，国外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已颇有积累。理论方法也已历经几代推进，形成多种观点并存、相互吸收的局面。目前，国内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尚未全面展开，对国外相关研究也介绍不多。笔者拟从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的三种主要视角着手，简要介绍它们各自的理论观点、研究方法及其研究成果。

对旅游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有多学科的特点，而且，在旅游研究领域，学者并不太注重学科边界，因而，本文提到的研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学者的研究。有些学者并不自认为是人类学者，但在研究时，却使用了与人类学相似的方法、采用了与人类学相似的观点。在旅游人类学研究权威史密斯（Valene Smith 1980）、莱特（James Lett 1989）和纳什（Dennison Nash 1991）等人的论述中也都把他们的研究看作是人类性质的，因而文本也会涉及他们的研究成果。^①

^① Valene Smith (1980) 和 James Lett (1989) 等人认为，在旅游研究中，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之处在于是否采用了全局性、比较的观点（方法），他们用此标准来衡量某一研究是否属于人类学性质的研究。





为了研究、理解他人，人类学者常常把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进行比较，而且通常是在一个能囊括所有相关人员在内的广阔背景之中作比较。这些传统方法在旅游人类学的研究中得到保持。此外，在旅游研究中，人类学者也一如既往地关心事件、行为主体——人（在人类学发展的历史上，试图研究并理解这些大量的、多样的“他人”，是形成不同观点的起因）。旅游中的这些“他人”包括游客、所有为游客服务的人以及游客活动范围内的其他人等等，为了理解这些“他人”，学者们从目的地人民、游客以及客源地社会这三个不同的视角出发，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形成了相应的理论、观点。关注目的地社会的人类学者认为旅游引发了当地社会文化的变迁，因而把旅游看作是一种涵化和发展形式；从游客出发，学者们认为旅游活动的结构、功能与人生经历仪式（rites of passage）相似，因而旅游可以看作一种世俗仪式；为了弄清楚旅游的成因，学者到客源地社会寻找答案，认为旅游是一种上层建筑，是依赖于期货更为根本的社会因素。下面，笔者尝试对这三种概念性观点进行简要介绍和论述。

一、从目的地社会出发进行的研究

关注文化接触和由此引发的文化变迁是人类学的一个传统。早在 19 世纪，人类学界就开始研究殖民统治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的影响。人类学者加入旅游研究似乎也源于这种对文化变迁的兴趣。这些对变化非常敏感的人类学者发现，旅游在他们所研究社会的发展中，作用相当复杂。他们甚至觉得，如果不重视旅游现象，就不能真正地把握自己所研究的社会。1963 年，人类学者努涅斯（Nunez）发表了一篇论文，论述了一个墨西哥山村开展周末旅游带来的影响（西方学者一般将其当作人类学者加入旅游研究的标记）。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研究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旅游人类学的主流。1974 年，旅游人类学的第一次研讨会在墨西哥城召开，影响研究是会议的主题。此后，该会议每年举行一次，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影响一直是其主要议题。

早期的研究常常是描述性的（理论研究相当少），并倾向于考虑旅游对目的地社会到底是益是害这一简单化的价值判断。有趣的是，以人类学

观点看问题的人大多对旅游的影响持否定态度。如哈莱尔-帮德(Harrell-Bond 1978)在《面向外部世界的一扇窗户:冈比亚的旅游和发展》一文中,对由外界刺激和外来导向引发的发展提出疑问。卢基西斯(Loukissas 1978)在《旅游和环境的冲突:以希腊马可纳斯(Mykonos)岛地区为例》中指出,旅游使马可纳斯地区环境恶化。李(Lee 1978)在《海滨的人行道归谁所有——尤喀坦(Yucatan)地区的权力结构》中认为,旅游提高了当地特权人物的地位。皮-桑亚(Pi-sunyer 1977)研究了布拉瓦海岸地区的大众旅游,认为它强化了陈规。科特克(Kottak 1966)认为大量度假家庭、钓鱼爱好者等的涌入使一个巴西渔村人们的公社生活遭受全面破坏。努涅斯(1977)对外来因素导致旅游目的地文化发生“可口可乐化”现象感到很失望。最有代表性的反对观点是格林伍德(Greenwood 1977)在《切开零售的文化》中提出的,他认为旅游使巴斯克地区阿拉德(Alarde)节日仪式商品化了。这一节日仪式深受人们喜欢,凝聚了许多当地传统文化。人们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成为现代市场机制中的一个元素是他所无法忍受的。阿罗内西(Arrones 1990)调查了西班牙南海岸旅游开发对当地人民的影响。当地的“阳光、大海和沙滩”对生活于欧洲北部地区的人们有着无比的吸引力,许多人在那里购屋,作为长期度假休憩之所。作者运用大量档案材料,通过访谈和参与观察,在《拍卖西班牙》一书中拒绝了这幅与众不同的城市化图景。指出旅游使当地经济严重依赖外来投资者,收入也大部分流入他们手中;外来人员对当地的控制权越来越大;而当地人与这些外来旅游者不能充分融合,管理这一变化中的、未融合的社会有很多政治问题;旅游区人口老龄化又加大了政府的压力。此外,当地人民可利用的土地越来越少、地下水枯竭等问题也不容忽视。

从这一观点出发,很容易把旅游与帝国主义行为联系起来,认为双方很容易形成统治—从属关系。但以更全面的眼光看问题,我们应该意识到当今世界的国际旅游很大部分是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之间,而且各国发展旅游的背景、条件、现实状况都不一样,因此不能一概而论,当然,可能由于人类学者过于关心文化交往中处于劣势位置的人民,太想帮助正在经历社会、文化变迁的目的地人民,也可能是受到新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的





影响，早期的人类学者一般都否定旅游开发的价值。

当然，也有一些早期研究者对发展旅游持肯定态度。如麦基恩 (Mckean 1976) 对巴厘岛、科恩 (Cohen 1979) 对泰国、波斯维恩 (Boissevain 1978) 对马耳他和曼斯浦格 (Mansperger 1981) 对布拉瓦海岸的研究，认为旅游是良性或者有益的发展途径。亚当斯 (Adams 1992) 在《旅游和尼泊尔夏尔巴人：相互关系的重建》中，探究了登山旅游对尼泊尔夏尔巴人工作方式、相互关系的影响。为了进行对比研究，她调查了两个群体。亚当斯还采用参与观察、半结构式访谈、参考文献资料等方法。最后她得出的结论是：旅游开发中，当地人民之间的互助协作关系和雇佣劳动关系同时得到加强，当地人并没有向通过旅游一步步渗透进来的资本主义力量屈服，而是成功地把新的生产方式融进了旧的生产关系模式中。

任何学科走向科学化的第一步是形成客观全面的分析方法。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学者们觉得这种以单一思维的方式进行的简单价值判断远不能适应复杂的社会情况。以较为客观的态度思考问题的人越来越多。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先驱，领导者加法尔·加法里 (Jafar Jafari) 所说的“以科学为基础的台阶”正在形成。例如，出席 1979 年世界银行召开的研讨会的人认为旅游后果很广泛，从好到坏都有，如果适当协调，目的地人民的收益可以大于付出。奥格尔索普 (Oglethrope 1984) 指出，马耳他的旅游发展中越来越依赖外国力量，因而，早期对马耳他旅游发展的乐观评价很难保持。韩国人类学者蒙 (Moon 1989)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调查了一个日本山村，调查前，她认为外来力量控制下的开发，如发展滑雪有害于当地山村生活。但调查后，她的观点改变了，认为“害”与“益”同时存在。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科恩 (1979) 的调查中。在这种“客观态度”潮流的影响下，部分人类学者开始重审早期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 1989 年史密斯 (V. Smith) 主编的《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再版 (这本书的两次出版，都代表了当时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发展状况，因而，被认为里程碑性质的著作)。1977 年的第一版中，学者们大多只把旅游当作引发当地社会变迁的因素，十多年后的跟踪调查使许多学者把旅游外的因素也包括进引发变迁的可能因素。如格林伍德 (1989) 指出，对旅游引发巴斯克地区节日仪式商品化的愤怒情绪阻碍了自己全面、客观地研

究这变化。

从旅游目的地社会、人民的影响的视角出发，人类学者认为旅游是一种涵化和发展形式，它使目的地社会文化发生变化。涵化是“由两个或多个文化体系接触、交流引发的文化变化”（SSRC Seminar 1954）。应该说，把旅游看作是一种涵化和发展的形式起源于人类学一贯的全局性观点。人类学通常认为，社会文化体系中的各因素都是相关的，其中某些因素的变化必然会导致另一些因素的改变。另一方面，为了阐明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人类学者从经济学中引入“连锁反应”概念，比如说，旅游部门的活动如饭店和机场的建立，又引发了另外的活动，如出现为工人服务的商业等等。“示范影响”是人类学者使用的另一概念，指游客以及与其相关的事成为目的地人民的效仿对象，它改变了当地人的价值观念、影响了当地文化。如今，学者使用得最多的概念是“商品化”，指旅游使目的地社会关系深受市场交换规则的影响，目的地一切吸引游客的东西都可以标上价格，在市场上买卖。上文提到的格林伍德对巴斯克地区阿拉德节日仪式的研究推动了这一概念的使用。今天，人类学、社会学和许多其他社会科学都在使用这一概念。“内化”（社会化）、“社会矛盾”（社会冲突）、“适应”等人类学概念在旅游研究中也大量使用。另外，“分解”、“复兴”等概念也开始用于旅游影响研究。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对旅游影响的研究有一个不断深入、完善的过程。在《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1977）第一版中，努涅斯就指出，不能把所有的变化都归因于旅游开发，同时，研究旅游影响要考虑接触双方的情况。纳什（1981）提出，在分析旅游活动和社会、文化变化的关系时，要清楚“相关”和“因果”的区别。史密斯（1989）指出，不同的游客类型造成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融入目的地社会、文化、生活的情况不一样。史密斯还根据游客融入情况对游客进行了分类。

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提出“替代性旅游”一词，提倡某些对当地环境、文化和社会影响较少的旅游形式。1992年，史密斯主编了《替代性旅游：旅游发展中的潜力和问题》，汇集了人类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各种观点。早期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受到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学者们越来越关注旅游对西方发达社会的影响，考察旅游





带来的噪音、交通拥挤以及犯罪率上升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从这一角度出发，许多人类学者把旅游开发与社区建设联系起来，考察如何使二者更好地互动。如皮尔斯、莫斯卡多和罗斯（Pearce、Moscardo & Ross 1996）研究了旅游对社区关系的影响以及社区居民的参与对旅游产业的影响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也进入学者们的视野，他们开始思考如何达到社会文化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最有代表性的是巴厘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研究由加拿大国际发展机构资助，研究者来自许多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他们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为巴厘岛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议。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对象都是民族旅游地。史密斯（1977）在《东道主与旅游——旅游人类学研究》中，曾把旅游分为五种形式，民族旅游就是其中一种。

民族地区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风俗习惯、民族艺术和手工制品等都有独特的特点，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而这些“独特”之处往往又正是“脆弱”之处，在外来文化的压力下，很容易地发生变化。格雷本（Graburn 1976）曾主编了一部论文集，讨论旅游影响下民族地区艺术品的变化。在这本书中他使用“第四世界”这一词代指仍处于传统社会的人群。他说：“第四世界是那些领土在第一、二、三世界国家之中，并受到他们的技术—官僚统治的原著民和当地人的总称。因而，他们是没有国家、通常属于少数人群的人。”由于与外界不断接触，他们原有的文化越来越接近周围的主流文化。许多人类学者把这种变化看作是旅游的消极影响。特纳和阿西（Turner & Ash 1975）的观点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那些在远离西方世界的地方发展起来的文化的审美、愉悦价值，很快就被游客优越的经济状况吞噬……今天的旅游已经开始了消灭文化的工作。”但同时，旅游加速了当地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的步伐，引入了新的文化因子；游客的到来，刺激了当地传统艺术，手工艺品等的复兴；旅游的收益可以改善当地自然环境、生活设施、交通条件等，因而也有一些人类学者认识到了旅游的正面作用。道尔（Dower 1974）的阐释体现了这一观点：“旅游应该可以与保护互相作用、共同得益……旅游和保护是互相领带的，双方都能从紧密、有效的合作中得益。”有关旅游对民族地区的影响的研

究，观点主要有这两种。上文提到的许多研究案例也都是在民族地区做的。只不过从总体上来看，这些研究更重视文化方面（包括物质形式的文化和非物质形式的文化），因为在民族地区，文化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

二、从游客角度出发的研究

旅行和迁移是人类社会广为存在的活动，它们带来了文化接触，造成了文化冲击。“文化冲击”一词因人类学者的使用而得以流行，但人类学者比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更晚地重视旅游对游客的影响，特别是对游客心理的影响。在大多数人类学者关注旅游对目的地社会的影响的同时，也有一部分学者从“游客”这一视角出发，研究人们的旅游动机、旅游体验，并分析旅游对游客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些学者探究的是旅游的文化、符号内涵。其中一些学者把旅游与人生经历仪式相比，认为旅游也是一种通过仪式。因为两者在结构（脱离原有状态—进入仪式过程—回到原来社会）、功能（对当事人产生一定影响，使当事人进入一种新的生活状态）。因而，认为旅游是一种世俗化的仪式、一种现代化仪式。从这一角度出发，学者提出“神圣的旅程”这一说法。

范·杰尼普（Van Gennep 1908）是把人生通过仪式进行扩展研究的第一人。利奇（E. Leach 1961）对人生通过仪式进行了人类学的阐释，将其引入人类学研究领域。特纳（Turner 1969, 1974）则把人生通过仪式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将其与旅游行为相类比，融合了杰尼普等人的观点。特纳认为，卷入“旅游仪式”的人首先经过一个“分离过程”，也就是他们远离并超脱于日常、例行的社会生活，进入一种“阈界”。此时，平日生活中程式化的、必然的一切都失去了它的规定性。在这一更自发、被解放的状态中，人们可能产生一些特别的感受。最后，仪式以再融入——人们回到原有的例行日常生活而结束。这一过程可能需要人们做很大的自我调整、自我适应。后来，特纳又对朝圣行为进行研究，认为它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和伊迪斯·特纳合作，1978）。研究中，特纳夫妇提出“阈界”和“社团”等概念。我们可能很难把以娱乐为主要特点的当代游客行为与严肃的宗教仪式联系起来，但游客和仪式中的人都会跨越多重“阈界”进入





多个“社团”的观点确实有其合理之处。莱特(1983)对加勒比地区租借豪华游艇纵情玩乐的游客的研究、瓦格纳(Wagner 1977)对在冈比亚海岸度假的瑞典游客行为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观点是正确的。

特纳对仪式过程的研究吸引了许多人类学者从事旅游研究。在其影响下,加法里(1990)提出“跳板”这一隐喻词,用“跳板”来比喻游客经过“特殊的旅行”过程中的解放和激励再次回到平常生活中。格雷本(1977, 1989)则提出“世俗—神圣—世俗”的旅游过程的观点,认为游客在降落(回到)日常的、世俗的、一般存在状态之前,经历了一个与平日不同的、神圣的“高点”。

格雷本(1977, 1983)深受这种游客体验的观点的影响。他详细地分析了旅游与仪式在结构、功能等方面的相似性,认为旅游是一种非常突出的世俗仪式,在许多当代社会中它都实现了从前由神圣的宗教仪式完成的功能。过去,人们通过宗教仪式实现某些需要、标志某些人生转变。今天,人们以旅游来实现这一切,格雷本认为人们的旅游行为反映一种全人类普遍存在的消遣、玩乐需要,正是这一需要,促使人们进行旅游。他还进一步地提出,人们有一倒换原有的生活经验的需要。他认为旅游为人们提供了从日常例行的生活中解脱出来的机会。同时,旅游中游客观赏的自然风光、异域文化都会令人产生非同一般的感受。它使个人在家乡原有的日复一日的的生活得以创新。因此,旅游使人们得到休息和放松,对于保持人们的生理、心理健康非常重要。

这种把旅游看作一种世俗仪式的观点展示了游客的旅游动机、体验和后果的仪式性特点。这一观点仍存在许多问题。学者对于这种过于概念化的研究方法以及人们是否确实有所谓的“倒换生活经验的需要”提出疑问。纳什(1984)指出,如果过分强调这种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方法,可能会忽视或轻视了更为多样的旅游体验及对其产生影响的背景。但这一观点也有优点。它开拓了研究视野,帮助人们从另一角度认识旅游现象,它也使我们认识到旅游观光行为的创造潜力以及它对个人的意义。

许多学者超越了这种过于概念化的分析,研究了具体情况中的游客行为和体验,并分析其原因和后果。有些学者指出,游客的旅游经历可能有负面影响,如文化冲击带来的心理障碍(Furnham 1984)以及旅游时与当